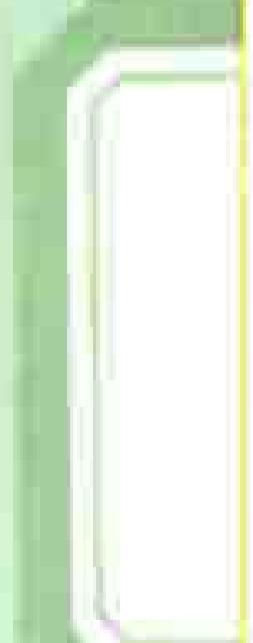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書局影印 宋史稿

中国华侨出版社
罗香林 普



罗香林 著

客家源流考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客家源流考

著者 罗香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林

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

(邮政编码：100000)

经销商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印刷者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 大三十二开

印张 三·五印张 插页：三张

版次 一九八九年十月第一版

印次 一九八九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 ISBN七八〇〇七四一五九二六·廿六
定价 一·八〇元

出版前言

作为汉族中的客家民系，是一个极富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集群。几千年来，他们从中原向外迁徙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和海外各地。他们在流涉中对促进中原跟国内外的文化、经济交流以及民族交往，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。

《客家源流考》是我国研究客家民俗最具有权威的著作之一。作者罗香林，一九〇六年十月份于广东兴宁县，一九七八年四月病逝于香港。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，毕生治史，先后有《客家研究导论》、《国父家世源流考》、《中国族谱研究》等专著。在《客家源流考》中，他对客家的源流、系统、分布、语言的特点以及五次迁徙的原因与路线，作了十分详细的考证和阐释。因此，这部著作一直为海内外客家人奉为『经典』，作为维系亲情、唤起民族自尊心，保持与发扬中华文化传统的一『教科书』。遗憾的是，因为种种原因，近四十年来，这部著作没有在国内重印^过，在海外虽有翻印，也多作为非卖品内部发行。为此，我们根据香港嘉应商会印制的非卖品——《客家源流考》一书影印出版，公开发行，以飨海内外读者。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一九八九年十月

客家源流考目次

一、緒論

二、中華民族的構成和演進

三、中華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統

四、客家的分佈及其自然環境

五、客家語言的特徵

六、結論

客家源流考

羅香林

一、結論

記得在民國元年，即一九一一年，英國長老會和美國浸信會，在汕頭舉行關於宗教的會議，有一位英國教士艮貝爾氏（George Campbell），因為曾在客人住的地方，傳教多年，見聞確切，特地在會議席上報告客家的歷史和現狀。（註一）。他結語說：『客家人比城裏人勇敢，富有特立獨行的氣概，渴愛自由。……滿洲人入主中國，客家人降服得最遲，並且會經一再起兵反正，第一次就是太平天國的事，第二次就是（這世紀內新近的事）』。

『客家人確是中華民族裏最顯著，最堅強有力的一派。他們的由來遷徙，種種經歷，確替他們養成一種愛種愛家的心理，同仇敵愾的精神，對於前途中華民族的奮發和進步，客籍人的貢獻，將見一天大似一天，這是可以斷言。』

後來艮貝爾氏又把這個報告印成長約十頁的小書，叫做「客家源流與遷移」（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e）。（註二）。這是英國教士們，有眼光的，明白客家的歷史和現狀後，所得的說法。

民國十三年，即一九二四年，美國耶路大學教授韓廷敦氏（Elsworth Huntington），著「種族的品性」一書（The Character of Races），裏面專門論述中華民族的，占有四章，（註三），於客家的特性，尤有深切的論述。他說：

『客家人的歷史，很值得仔細的研究。許多有眼力的人，不說過麼，他們是今日「中華民族裏的精華」。他們的毅力，愛清潔的習慣，對於婦女的尊重，和教育程度的卓越，都是難得的特點。他們和比他們早到南方的移民，就是現在圍着他們的土著，很不相同，好比這些比較進步的南方土著和現在還在北方的中國人的不同一樣。……客家人要不是因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壓迫，大概也不會離開北方的老家的。在這層上我們確有相當書面的證據』。

『當他們遷移的時候，自然淘汰的勢力，一定很活動，逐漸把懦弱的，重保守的分子，收拾了去，或是留在後面。所以凡是能夠到達新地方的分子，都是比較有毅力有才幹的』。

『關於客家人的情形，第一件可以注意的事，便是他們的方言，他們說的實在是一種官話，和四圍非客家人的话很不相同，但是很像現在中州河南的話。客家人原出北方，在這一點上，就可以看出來』。

韓廷敦教授於人文地理學，最負盛名，這「種族的品性」一書，更是他精心結集的著作。這是美國學者們，明白客家的特性和關係後，所得的說法。

反觀中國學者，對於客家的現狀和特性，能像艮韓二氏「深切著明」的，却還很少。這一半是因中國學者，比較少注意實地的考驗，少從事歸納的研究，故雖有關於客家問題一類的論述，然除一二關於客語的實地調查外，大率亦多長於文詞的勝美，而缺乏科學實證的精神。筆者於民國二十二年，即一九三三年，曾作「客家研究導論」一書，（註四），雖篇幅較艮韓二氏論述客家的文字，多得多了，然關於客家特性的分析，也未能有超過艮韓二氏的說明。這可知艮韓二氏的說法，直到現在，還是研究客家問題的重要文獻，不能不特加注意，而感謝其啟發的功能。

從艮韓二氏說法分析，可得幾種認識，或幾種意義：第一，這所謂客家是中華民族裏的精華。第二，這客家是從中國北方遷移到南方來的。第三，這客家有其所由生存發展的特性。第四，這客家的方言，是比較近於中原語音的一種官話。

這四種意義，自然艮韓二氏，也會略為舉例說明，不過限於篇幅，只是發其端緒，未能窮其幾極。尤其是關於客家先民自北方遷到南方的經歷，幾乎牽涉中國歷史的全部，二氏說的，還是不夠，必須更為翔實的考證，方能把眞諦盡為說明。

其次，客家特性的由來，固然頗受因展轉遷移而起的選擇與優生的影響而成，然而與其居地分佈的環境關係，亦不無相當的影響。艮韓二氏於客家居地的分佈，說的還是不夠，還得再加補充。

復次，客家方言，固為近於中原語音的一種官話，然而中原語音亦是以時變遷的，究竟客語為近於何一時期的中原語音？實在還有檢討的必要。這是中國歷代語音或音韻沿革與客語關係的問題，非三言兩語所能判定。而欲為檢討客語的性質，又須先為

分析其聲紐韻部音素與詞彙等。近人研究客方言的，或從音義訓詁入手，以說明客語與古語的關係，（註五），或從實地調查入手，（註六），以分析其聲紐韻部及音素。究之二者所得，仍須互為參證，方能有所發明。這點也得再加補充。

筆者昔年著「客家研究導論」時，嘗欲就有關客家各問題，各為蒐集資料，撰作專書，而綜合為「客家研究叢書」。世事變遷，久無所就，真不勝慚愧！茲不揣淺陋，依上述各點，試就已有資料，略加比證，撰述「客家源流考」這篇論文。這是預計中「客家研究叢書」的一種，還是未定的初稿，希望客家人及國內外專門學者，惠予指正，或賜寄有關資料，俾得以時補充，那就感激高誼，非言語可形容了。

附 註

（註一）良貝爾氏（George Campbell）演講詞見上海出版的英文「教務雜誌」（China Recorder XVIII, Shanghai.）。

（註二），艮貝爾氏關於「客家源流與遷移」演講詞之單行本，後被韓廷敦教授（Ellsworth Huntington）摘要採入伊所著「種族的品性」（The Character of Race）書中。民國十二年友人鍾魯齋先生曾將艮氏原文譯成中文，載「旅滬嘉應學生會」所出「嘉應」第一卷第三期。

（註三），韓廷敦教授「種族的品性」一書為權威著作，出版不久，即蜚聲歐美，其關於中國民族之四章文字，後由潘光旦先生譯為一書，題曰「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」，一九二九年出版於上海新月書店。

（註四），筆者所著「客家研究導論」約二十五萬字，民國二十二年希山書局印出初版，二十七年由新架坡客屬總會再版。日本昭和十六年台灣銀行調查課長有元剛，復為譯成日文印行。

（註五），依楊雄「方言」一類常言熟語的彙集或訓釋方式以著錄客方言的，首為黃釗「石窟一徵」的方言，次為溫仲和等纂「嘉慶州志」的方言，史楊恭桓撰「客話本字」等書，家譜其（譜雲）先生集客方言訓釋的大成，著「客方言」十二卷，最負盛名。

（註六），友人王力教授著「兩粵音說」一論文，見清華學報一卷五期，其關於客語方面的論述，蓋即根據伊鄉廣西博白縣客語的調查而著錄的。近年中央研究院某君，復調查四川華陽縣之客家方言，其研究報告，亦甚翔實。但因華陽客家本遷入較晚，其客語已略有演變，故不以他為客語的代表。

「客家是中華民族裏的精華」，也可說是中華民族裏的一支，所以在未有討論客家的源流和組成以前，須得先把中華民族的構成，及其有關的事變，說個明白。因為這是客家先民所由遷移及其系統所由組成的先決問題，不把牠先行說明，對於客家源流和組成的問題，是不易考述的。

中華民族的人種來源是發祥於中土本身的。（註一）。根據研究的結果，在史前時代，這發祥於中土的人種，因為分佈相當的廣，各以應付特殊的環境，以及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逐漸演進，形成了五個重要的氏族集團。（註二）。這五個氏族集團，雖說遠的來源相同，然以各有其分佈的區域，各有其傳統的習尚，而其各別的特性，也隨而成立。現在把這些氏族集團，略為分析一下：

其一為夏氏族集團。這集團原分佈於今日川陝岷山和岷江流域一帶，（註三），其後分為二支，北上一支，分佈於陝西的漢水上游，和渭水流域等地。其西南一支，分佈於滇黔桂粵閩浙等地。這集團的文化特質，一為攻的使用，特別發達，一為城郭的發明與運用。而這西南一支，後來又演稱為戎，亦書作越，（註四），這就是因為他們善於用攻而得名的。他們更分佈於接連桂桂的邊徼地帶。

其二為羌氏族集團。這集團分佈於今日青海西藏等地，及西康，甘肅，陝西的一部分，以及接連西藏的邊徼地帶。（註五）。

其三為狄氏族集團。這集團分佈於今日新疆，寧夏，蒙古，綏遠，熱河，察哈爾，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，以至於接連蒙古的邊徼地帶。（註六）。

其四為夷族集團。這集團分佈於今日江蘇北部，以至安徽，山東，河南，遼寧，吉林，黑龍江，以及朝鮮半島等。文化的特徵為弓矢的發明和運用。「夷」就是「帶弓之人」的意思。稍後分佈於遼吉黑等地的夷，又演稱為「東胡」。（註七）。

其五為蠻氏族集團。這集團分佈於今日湖北，湖南，江西，和廣西，貴州的一部分，以至中南半島的一部分。（註八）。

這些氏族集團，後來怎樣的成爲有系統有組織的國家呢？這確有說明的必要。大概就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，以至石銅並用時代的初期，中土的一部分，因爲有洪水泛濫的鉅變，其中有不少的氏族，却利用其不得不遷移的環境，及其文化的特徵，進展到別的氏族分佈地域裏去。而夏氏族集團就是因爲受了這種激刺，一方於發祥地域從事治水的工作，一方復自然的將一部分的人民遷移到別的氏族分佈地域裏去，憑藉着上世來源相同的關係，並利用他優越的文化，尤其是城堡的運用，很順適的由岷江流域而漢水上游，而渭水流域，而洛水流域，卒以奠定了中土的中部。（註九）。他們的首領，就是夏禹。所以史記夏本紀，有「徙衆居民，乃定萬國」的追記。那時所謂萬國，就是各氏族集團裏的許許多多的小單位。這樣一來，夏氏族集團便與羌，狄，夷，蠻等氏族集團，互相混合，由混合演進而成爲一種新的組織，一方有所以維繫這種混合的中央政府，這是歷史上稱爲夏朝的由來；一方有所以維繫這種新組織的共同名號和意識，這就是「中夏」和「華夏」或「中華」等名號和意識的由來，也就是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由來。（註十）。而這時以承襲歷來的經驗，已有相當的文字，已有相當的典章制度，已有完整的國家規模。中國之所以爲民族的統一國家，就是肇端於此。

但是這新組織的勢力，到底不能一下子就普遍於整個中土，所以就是向日夏氏族集團的部分，其分佈於中土西南部或南部的一支，仍不能全體與這新的組織相融合，其他離中土中部較遠的各氏族集團的若干部分，也有同樣的情形。所以同是向日夏氏族集團的苗裔，有的已爲新組織即「中夏」的一個單位，有的則仍舊保存他傳統的形態，而演爲「百越」，同是向日羌氏族集團的苗裔，有的已爲中夏的一部分，有的又演爲「西羌」或「西戎」，同是向日狄氏族集團的苗裔，有的已爲「中夏」的一部分，有的又演爲「北狄」，同是向日夷氏族集團的苗裔，有的已爲「中夏」的一部分，有的又演爲「東夷」或「東胡」，同是向日蠻氏族集團的苗裔，有的已爲「中夏」的一部分，有的又演爲「南蠻」。這些東夷、南蠻、西羌、北狄、與「中夏」爲同一種源，「中夏」系統中也有他們血統的重要成分，然以「中夏」爲新的組合，而這些人們，以未及加入這新的組合，相形之下，發生彼此習性各別的觀感，一側進步甚速，一則進步較遲，所以便有互相對待的意識。尚書舜典有「蠻夷猾夏」的語句，武成有「華夏蠻貊，罔不率俾」的語句，左傳闔公元年，有「戎狄豺狼，不可厭也，諸夏親暱，不可棄也」的語句，定公十年有「裔不謀夏，夷

「不亂華」的語句，論語有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」，的語句，孟子有「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，」的語句，都是中國民族國家的意識發端於夏朝的明證。（註十一）。這就是中華民族所由構成的重要開端。

總之，自夏朝起，中華民族始有完整的國家組織，同時也自夏朝起，中華民族始有顯著的民族意識。所以我們常說，夏朝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開端。

自夏朝統一中土後，在政治方面，確立了一種傳子的制度，在天文曆法方面，更有重要的發明，在經濟方面，則注重農業的發展。從前的人有所謂「行夏之時」，有所謂「夏啓嗣禹位」，有所謂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致力乎溝洫」，那就是夏代文化的反映。（註十二）。但是夏朝傳了四百多年後，這中央統率首領的地位，便為諸侯中的殷商首領所代替了。商朝的先代，大概是從夷氏族集團所演進的，因為住的地方叫做商，所以他代替夏朝以後，便將國家的名稱，改號為商。（註十三）。開創的首領，就是成湯，這就是歷史上商朝的由來。商朝在政治方面，施行一種「兄終弟及」的制度，在行事方面，特別注重嫡子的辦法，在民族方面，和夏朝一樣的在推行混合的作用，而文化方面，也比夏代更進步了。他傳了六百年，中央統率首領的地位，終為諸侯中的成周首領所代替。這代替商朝的首領，就是周文王和武王，乃至周公等，他的先代大概是以前氏族集團的一部分為主幹，而摻和了不少羌氏集團的血緣，而成為諸夏系統的一支的。（註十四）。所以詩經魯頌閟宮，述成周的源流說：「赫赫姜嫄，是生后稷，奄有下土，續禹之緒」。而尚書康誥，亦說：「惟乃丕顯考文王，克明德慎罰，不敢侮矜寡，庸庸祇祇，畏威顯民，需肇造我區夏」。而詩經大雅蕩所謂「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，殷盤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」，且更有為夏禹光復的口氣。

成周自周武王光復禹甸，即以「興滅國，繼絕世」為口號，陸續的封建諸侯。其後，統一了中國，代替了商朝，更開行封建的政策。而同時復推行宗法和通婚制度，以為維繫國家和社會的基礎，到了周公攝政，又以當時全國人民的宗教信仰，多數沿襲往昔各氏族集團時代的遺留，而沒有一種共同的精神生活，乃為提倡禮樂生活，以代替宗教。這封建政策，宗法制度，和禮樂生活，就是成周統一國家，與融和民族的唯一辦法。（註十五）。這辦法在當時確有其偉大的功能，中華民族所以能完成他偉大的

系統，實與這辦法的運用有很大的關係。西周以前，整個中國的國家組織，和民族自覺的意識，固然有了，但是他們的文化，還沒有發展到可以維繫全局的境地，國家的組織，也還不十分堅固，民族的體系，還不十分堅實完整。到了西周，經過了這三種政策的運用，政令的推廣，禮樂的普及，血統的融和，却比夏商強烈，所以中華民族的體系，到此纔完成到相當的程度。此時「中夏」或「華夏」的意識，更為深刻，更為普遍，「中夏」或「華夏」的文化，更成整體的周流，「中夏」或「華夏」的種人，更為繁昌而活潑。雖然，不久到了春秋戰國，天子封建的制度，已慢慢的搖動，慢慢的轉變，諸侯與諸侯間，由互爭霸權，而至互爭統治全國的權，然而整個「中夏」或「華夏」的意識，却不因此動搖，而且反而增加，要求整個國家的統一的欲望，也反因而日見普遍，終以促成了秦始皇的統一中國，以郡縣的制度，代替了封建的制度。秦和周，雖然因為所處時代不同，一則創導封建的制度，一則創導郡縣的制度，然在整個中華民族長成的歷史看來，是各有功能的，他們的政治制度，是相反而相成的。其後到了漢代，中國的威力益增，國人竟以「振大漢之天聲」自詡，而中夏系統的中華民族，便又常常稱為漢族。（註十六）。

自秦始皇統一了中國，以前全國的力量都集中於統一的工作，而減少邊疆的工作，所以到了秦代統一工作完成的時候，而邊疆的問題也就接着起來了。我們知道，周朝的統一全國，努力推行三種重要的政策，固然會經收到很大的效果，不過這種政策，這種制度，所能實施的範圍，在當時是有一定限度的，在那政策和制度的力量所及的地方，自然所有的人民不管他上代是屬於那氏族集團的，都能混成一個完整的體系，然其力量達不到的地方，則不免發生各自為政，各自過其傳統生活的現象，譬如夷羌狄蠻的一部分，在夏商時，已演進為「中夏」的骨幹，到了西周，更是融和而不可復分，但這些氏族集團的遺裔，有的分佈稍遠，而處於邊陲，周朝的政策和制度，便一時未必都能達到。這些為周朝的政策和制度所不能達到的地方，與實施那些政策和制度的地方，雖說所有的人民都是同出一源，而且前者的一部分，是早融和於後者的，然而却因那些政策和制度的已推及與未推及，而演化為若干的小異，前者常保存他們傳統的習俗，後者愈推行新制度而愈進步，因此相形之下，覺有二種不同的形式，前者以離中央政府較遠，所以稱其地為邊疆，（註十七），稱其人民為邊區部族，後者以在新制度的涵育下，且與中央政府相接近，所以稱他為內地，而其人民亦文化較高。而內地與邊疆，又以自然地理與文化演進的關係，構成兩種不同的現象：

其一在內地方面，因為地方適在溫帶，且為河流所經的平原，所以氣候溫和，水利充足，土地肥美，高度的農業容易發展，財富易以增加，因而進為文明富庶的區域。

其二在邊區方面，因為地理的分佈或為高原，或為山地，氣候較寒，或較酷熱，因而過着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，或比較原始的農業生活。

在這兩種現象相形下，很容易引起邊疆人民不自滿足的感覺，發生種種內侵的欲求和行動。而內地人民為求保護他們原有的繁榮起見，不得不另作新的應付辦法。（註十八）。這辦法約有三種形式：

其一為以實力抗拒，或擇地開發。中土人民，對於邊疆部族的內侵，自然很是憤慨，最初是決計要把他們克服的，而尤重視選擇重要的據點，為積極的開發。如漢唐的經營高麗和西域以及越南等，就適為保障邊疆的三大據點。但是這種辦法，仍不容易推廣，尤其是在內地多事的時候，對於邊疆部族，每只能採取防守的辦法。

其二為築城防禦。武力抗拒，既有時不易辦到，便想出築城防守的辦法。中國歷代對於北部的邊疆，多取築城防禦的政策，這就是萬里長城的由來。迫使邊疆部族，不容易越塞內侵，故秦代和隋代，皆努力從事這種工作。不過這種政策，亦只能防範一時，而不能防範永久，對立的意識，不但不能因此減少，而且每因此加深。

其三為招致內徙，或聽其內徙。武力的抗拒，與築城的防禦，既都不能絕對的解除邊患，而主持國家大計的人們，為時勢所迫，便每轉而實施招致邊疆部族內徙，或聽其內徙的政策。結果遂產生二種極可注意的事勢，其一為邊疆部族的逐漸同化於中華民族，其二為中華民族中內地居民的逐漸南徙。大概邊區一部分的部族，招致內徙後，其初只能居於歷史上所稱的塞下，生活雖可逐漸改善，但其不自滿足的心理，仍未能即為排除，而且以學習內地語言或其他技術的關係，往往更以養成其畸形的心理，一旦內地的政局有所不安，則他們不難為乘時割據的行動，（註十九），割據至相當的時期，則皆同化於整個的中華民族。又因其發展的方向，已自邊疆而進為內地，則其原日的塞外住地，往往無形中便空曠了，水草或其他物質，日益長盛，後面的別的部族或其他左右隣的部族，便可利用這空曠的地區，而得到相當發展的機會，發展到相當的程度，又照前一部族的方式，而向內地不

斷的侵入，或自動的內徙，因而又構成了另一割據的局面，終以又同化於中華民族。其原日後面的別的部族，或左右隣的部族，又因他而得到發展的機會，照樣的內徙，久之也同化於中華民族。不過中華民族裏面住在內地的人民，却因此而不知經過了多少的艱難困苦了。

我們打開歷史來看，當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，而出自北狄苗裔的匈奴，也以種種關係，得到了發展的機會，而成爲強大的組織。他不但統轄了北部的邊區，而且還急急內侵，秦始皇的修築萬里長城，實在是不得已的。（註二十）。其後到了兩漢，悉力從事匈奴邊區的經營，而西部的氐羌，和東部的東胡，便又乘機而起，到了東漢晚年以至三國時代的曹魏，便不得已而採用招致邊民內徙的政策，終以引起了晉代的五胡亂華。當東胡鮮卑一支發展到爲北魏系統的時候，而鮮卑背後叫做柔然的一個部族，又乘機而起。柔然鬧了不久，而隣居的突厥又起來了。當唐代把突厥問題解決了後，而東北邊區的契丹，又乘機興起，值五代雲擾，而寢向內地割據，改號曰遼。當遼人正向中土發展後，而其背後的女真，又乘機興起，終以把遼滅了，而代之向中土發展，改號曰金。當金人正向中土發展後，而其左隣的蒙古，又乘機而起，終以把金也滅了，建國號爲元，而且侵滅了宋朝。元朝後爲明朝所代替，而保存其勢力於北部沙漠以外，明代常與他擣兵，而其右隣的滿洲部落，又乘機向中國發展，建立了清朝。這五胡與柔然，突厥，遼，金，和蒙古，滿洲，後來大部分也同化於整個的中華民族。

其次說到因邊疆部族內徙或侵寇而引起的中華民族內地人民的遷移。我們知道，中國內地人民第一次的大遷移，是由五胡亂華所引起的。所謂五胡，就是匈奴，羯，鮮卑，和氐羌。實際上匈奴和羯，是古代狄氏族集團的一部分苗裔，鮮卑是東夷或稱東胡氏族集團的一部分苗裔，氐羌是羌氏族集團一部分的苗裔。他們之所以會起而割據中國的一部分，遠則肇因於東漢晚年以至三國曹魏的招致內徙，近則肇因於西晉的罷州郡兵權。我們知道，漢代的開發邊疆，雖確會收過很大的效果，但是到了季年，漸以招致邊疆部族內徙爲政策。後來州郡擁兵，演成三國鼎立的局面，使曹魏對於西北部，北部，和東北部的邊區部族，也只有採取而削弱，邊區內徙的部族，便得相繼乘機而起，於中國內地的一部分，建立他們的割據政權。晉代的中央政府，不得已也遷到建

康，就是現在的南京，內地的人民，因為不安於五胡的侵擾割據，有遷移力量的，或有遷移機會的，都相率南遷，當時稱爲流人。（註二十一）。他們遷移的路線，與到達的地點，或移居的結果，形成了三大支流，現在且分說如下：

其一爲一部分居於今日陝西甘肅以及山西一部分的人民，當時稱爲「秦雍流人」，他們展轉遷徙，初沿漢水流域，順流而下，渡過長江，而達洞庭湖區域，其更遠的，且溯湘水，轉至桂林，沿西江而移入廣東的中部或西部。

其二爲一部分居於今日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的人民，當時稱爲「司豫流人」，他們展轉遷徙，初沿汝水，而下長江，渡江後，分佈於江西的鄱陽湖區域，或順長江而下，達皖蘇的中部，或溯贛江，而至粵贛閩交界地。

其三爲一部分居於今日山東以及江蘇安徽一部分的人民，當時稱爲「青徐流人」，他們也展轉遷徙，初循淮水而下，越長江而分佈於太湖區域，其更遠的則分佈於浙江福建的沿海。東晉以至宋齊梁陳各朝代的局面，在經濟方面，開發了南方的產業，增進了南方的生活，而在民族方面，支持了東晉以至宋齊梁陳的中樞主要人物，多屬於這一支的分子。

中國內地的人民第二次的大遷移，是由南詔的內侵而引起的。所謂南詔，就是由百越一支的苗裔和西羌一支的苗裔，所混合建設的在西南邊疆的一個割據政權，地點就在今日的雲南。（註二十二）。他在唐太宗以後，日在發展，屢屢擾亂今日的四川和廣西，唐代爲着防止他們的擾擾，就在廣西的桂林和四川的雅安松潘等地，駐了不少的軍隊。就中駐守桂林的軍隊，在懿宗咸通年間，竟因故叛變，擁戴龐勛爲首領，由桂林而湖南而江淮，一路擾掠回來，唐代費了相當的力量，才把他們解散。但不久而寇句人黃巢，又起而作亂，他結集龐勛的餘黨，所以很快的就成爲掀然大波的亂源。他從河南山南二道進掠淮南，轉掠浙東，又走江西北部中部，更至福建的西部中部，又回江西，出湖南，至廣西東部，而南下廣州，後又退回湖南而出湖北，擾安徽，渡淮水，攻洛陽，進破長安，而中國內地差不多都給他擾亂了。（註二十三）。因而引起中國內地人民的分頭遷徙。黃巢的變亂，經過了十年的征剿，雖然幸告平息，然而他的黨羽朱溫，投降唐朝後，反而做了汴梁節度使，終以把唐的政權篡奪了，而改號曰梁，開了五代割據的局勢，中國內地的紛亂也沒有停止，因而使中國內地的人民，仍然繼續黃巢大亂時的情形，而分頭遷移。這遷移

的終點，和他們的結果，歸納起來，可以得到幾個系統：其一為遷移於四川的人民，後來王建就以他們為一部分的基礎，而建立了蜀的割據政權。其二為遷移於湖南的人民，後來馬殷即以他們為一部分的基礎，而建立了馬楚割據政權。其三為遷移於廣東中部與廣西南部的人民，後來劉鋹以他們為一部分的基礎，而建立了南漢的割據政權。其四為遷移於福建的人民，後來王審知以他們為一部分的基礎，而建立了閩的割據政權。其五為遷移於兩浙的人民，後來錢鏗以他們為一部分的基礎，而建立了吳越的割據政權。其六為遷移於江蘇的人民，後來楊行密和李知誥便先後以他們為一部分的基礎，而建立了楊吳與南唐的割據政權。這些割據政權，因為各自為政，各有特殊的風氣，兼以當時居住的部族分支也有點不同，所以慢慢的就成為各種大同小異的方言。五代割據的局面，雖然不久便停止了，但這些方言和風氣，還保存了他的體系。這就是由南詔內侵所引起的中國內地人民大遷移的結果。

客家是中國民族裏的一支，他們的先民，就是因為受了邊疆部族侵擾的影響，才逐漸自中原南遷到南方來的。下面就要考述客家先民自中原南遷的景況。

附 註

(註一)，見筆者另著「中華民族的長成和發展」(在民國三十一年三民主義半月刊發表)，並參照 J. C. Anderson: *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* (1934)，及 H. G. Creel: *The Birth of China* (1936)。

(註二)，見筆者另著「中華民族的長成和發展」。

(註三)，見筆者另著「中夏系統中之百越」(獨立出版社出版)第一章「夏民族源流考」。

(註四)，見筆者另著「中夏系統中之百越」第二章「越族源出於夏民族考」。

(註五)，見梁任公(啓超)先生飲冰室文集卷三十五「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」，與卷六十六「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」，及莊學本「羌戎考察記」(上海良友書局出版)。

(註六)，見光漢子「中國民族志」第三章「夏殷之形勢及西周與異族之關係」，及日人白鳥庫吉「東胡民族考」，(商務印書館有方壯猷譯本)。

客家源流考

一一一

(註七)，同註六。

(註八)，見史記楚世家，及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。

(註九)，見筆者另著「中夏系統中之百越」第一章「夏民族源流考」。

(註十)，見筆者另著「中華民族的長成和發展」。

(註十一)，見筆者另著「漢族的構成」，(在民族文化半月刊一卷二期發表)。

(註十二)，見史記夏本紀。

(註十三)，見史記商本紀。及王靜安(國維)先生「觀堂集林」卷十二「說商」。

(註十四)，見史記周本紀。

(註十五)，見筆者另著「中華民族之長成與發展」及「制禮與作樂」，(文載風物志創刊號)。

(註十六)，見光漢子「中國民族志」第八，第九章。

(註十七)，見筆者另著「中華民族之長成與發展」。

(註十八)，同註十七。

(註十九)，見光漢子「中國民族志」第八章。

(註二十)，見史記秦本紀。

(註二十一)，見晉書地理志。

(註二十二)，見兩唐書南蠻傳，及筆者另著「南詔種屬攷」，(文載中山大學中山學報第一期)。

(註二十三)，見兩唐書卷二百下黃巢傳。